

1949—1961 年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的历史考察^{*}

徐 玲

[摘 要] 1949—1961 年,传统王权宫殿和原中华民国国家博物馆的双重身份,使故宫博物院的改造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这表现在,既有如何处置传统皇权建筑、收藏等物质层面的历史性,又有如何调整中华民国博物馆陈列模式以期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的现实性两方面问题。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在故宫博物院空间改造问题上表达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同时在陈列模式、藏品体系上赋予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用“人民性”置换了传统的“皇权观”,完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革命性改造。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博物馆史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2)06-0075-08

1925 年,故宫博物院建成开放,以公共博物馆的形式重构了清室宫殿和收藏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性质问题再度引起关注。经过从建筑空间、陈列模式到收藏体系的一系列革命性改造后,故宫于 1961 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预示着故宫博物院获得了新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身份。考察 1949—1961 年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历史,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国家文化重建和博物馆文化转向的有效途径之一。囿于学科分割,从革命性改造角度探讨此时段故宫博物院历史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①。在此,分别从 1949 年后故宫博物院改造问题的提出和初步处置,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定位和目标,故宫博物院空间、陈列模式和收藏体系的调整,以及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的意义等方面,历史考察 1949—1961 年故宫博物院的革命性改造。

一 1949 年后故宫博物院改造问题的提出和初步处置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3 月 6 日故宫博物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接管^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央性博物馆之一。

故宫博物院方面,因平津战役,早在 1948 年 12 月 14 日“院中及太庙、景山”等处已暂停开放^③。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博物馆史研究(1949—1966)”(18BKG039)。

① 已有故宫博物院院史的研究多集中于民国时期,代表性成果有:季剑青《“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存》(《近代史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62~81 页),从收藏属性方面探讨了早期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合法性问题;郑欣淼《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5 期,第 6~22 页),论述了辛亥革命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间的关系,认为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的另一项重要政治成果;李文儒《从皇宫到故宫到博物院——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6 期,第 6~13 页),讨论了促使从皇宫到博物院转变的政治因素;徐婉玲《博物馆与国家认同之建构——以故宫博物院开院为中心》(《故宫学刊》2013 年第 2 期,第 396~413 页),探讨了故宫博物院与民国时期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1949 年后故宫博物院历史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对本文启发较大的文章是卫东风等《改造和整顿时期中国博物馆展览活动案例分析》(《中国博物馆》2008 年第 4 期,第 91~97 页),讨论了 1949—1952 年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的改造问题,认为改造后的陈列形式整体进步了。

② 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于 1949 年 1 月 1 日,下设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作为文化接管委员会内设机构之一,负责北平文博单位的接收、整顿等管理工作。1949 年 6 月 6 日,文物部划归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文物处。1949 年 11 月 1 日,文化部文物局成立。文物处工作转交文化部文物局。

③ 《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1948 年 12 月 14 日,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 页。

1949年1月26日,韩寿萱、裴文中、唐兰、王重民、金毓黻、向达^①等人与马衡见面“谈博物、图书等社交机关及考古事业今后应取何态度”^②。马衡还通过在文化接管委员会工作的次子马彦祥打听文博单位的接管政策。北平和平解放当日,除向达外其余几位再次聚谈,“寿萱、文中、立庵、有三、静庵来商博物、图书等馆新方案”^③。此次商议的“新方案”,应是几位北平文博单位领导对文物部新部署的回应。2月2日,马衡已经得知接管故宫博物院者为尹达、王冶秋等,开始积极准备交接材料^④。2月13日,在北平图书馆召开博物馆图书馆二协会联席会议,“通过《从事图书馆博物馆及考古工作者的意见》一议案,俾建议于文化接管委员会”^⑤。3月6日,马衡参加文物部召开的故宫博物院接管大会,表达了自己的拥护之意。文物部通过早期搜集的信息,评价马衡是“德高望重、热爱文物如生命、政治上进步的院长”。因此在接管大会上,尹达郑重宣布马衡留任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⑥。

新形势下,故宫博物院性质、任务的定位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接管大会上,尹达宣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故宫博物院获得新生,成为“人民的博物馆了”。3月16日,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邀请郭沫若、翦伯赞、田汉、楚图南等40余位文化界人士座谈故宫博物院性质、方针问题。会上翦伯赞认为故宫博物院的新变化应是“文物由士大夫阶级转到人民手里”;田汉发言称故宫博物院今后更重要的任务“应使人民从故宫看到历史”^⑦。1949年4月,文物部宣布故宫博物院新的业务方针是:“要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为工作之目标。”^⑧1949年8月,裴文中再次强调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现在及将来的任务“须配合政策,适应要求”^⑨。

1950年初,文物局为了解全国博物馆机构的实际情况,开展全国博物馆调查工作^⑩,共向全国发出《博物馆概况调查表》157份,收回调查表21份^⑪。调查内容除博物馆一般业务外,还涉及各馆的群众工作、发展计划及困难问题等。文物局综合研究调查材料后,向文化部提出“恢复和改造原有博物馆,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⑫,尤其需要重点改造的是文化部直属的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两馆。文化部先明确了全国博物馆的改造目标:“博物馆工作的目标是要具体的表现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最高成就。旧有博物馆正依据此目标加以改造,新创立的,本此目标而迈进。”^⑬郑振铎补充解释说:“怎样把博物馆服务于劳动大众,是我们当前的最大的任务和目标。”^⑭王冶秋进一步提出,“故宫博物院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充分发挥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⑮。作为回应,马衡在庆祝建院廿五周年纪念报告中,将1949—1950年称为故宫博物院的“革新期”,呼吁“同人循此方向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⑯。“整理与改革旧有博物馆”使其成为进行群众教育的重要工具,成为1950年文化部工作要点之一。在文化部1951年工作规划中,明确故宫博物院要继续“改进陈列方法,加强群众工作”^⑰。1951年10月,文化部颁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

① 韩寿萱,留美归国的博物馆学家,时兼任北平历史博物馆馆长;裴文中,留法归国的史前考古学家,时参与北平历史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唐兰,著名青铜器专家,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图书馆学家,时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金毓黻,时任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随该筹备委员会古物、图书迁景山寿皇殿暂住北平;向达,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②③④⑤⑥⑦ 《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1949年1月26日,1月31日,2月2日,2月13日,8月23日,1950年10月10日,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0、41、44、80、156页。

⑧⑨ 于坚、任昉:《接管故宫前后》,《故宫学刊》2015年第3期,第72~87页。

⑩ 国家文物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1999)》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⑪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关于博物馆实际情况调查的通知》(教秘权字第82号)(1950年1月2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198-341。

⑫ 《我局展开全国图博文物调查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期,第31~32页。

⑬ 《一年来文物工作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期,第1~24页。

⑭ 郑振铎:《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1950年9月18日),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⑮ 郑振铎:《怎样把图书馆、博物馆服务于劳动大众》(1950年10月),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第94页。

⑯ 柴章骥、蔡学昌:《杰出的创业者》,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⑰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零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6期,第11~22页。

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①尤其强调原有博物馆改造时,必须清除原陈列中缺乏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的封建性、殖民地性糟粕,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举办新的陈列展览等。1951年12月,文化部召集故宫博物院内外专家举办两次座谈会,专门研讨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的改造计划,初步确定了综合陈列、原状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陈列四种形式。

1950年2月,随着北平更名为“北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更名为“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1951年6月,又更改名为“故宫博物院”。机构方面,被接管早期文物部有把其他博物馆机构并入故宫博物院的提议。1949年3月,在文物部召开的文物座谈会上公布讨论的几个草拟方案中,有历史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合并的议案。对此,马衡明确反对:“谓本院所接收、保管、整理者,完全为清宫建筑及其文物,非清宫旧有者不在此列。”^②认为要维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特殊性。1950年6月,文化部颁布《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指出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各有特色,不宜合并。1951年5月,故宫博物院全面调整了建院以来的内部组织机构,将原有的古物馆、文献馆、图书馆和总务处调整为陈列、保管、群众工作及古建筑管理等部^③。其中群众工作部的设立,最能体现“人民的博物馆”新方针。人事方面,1952年5月马衡“因事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离开院长职位;1954年6月,革命出身的中共华东分局副秘书长吴仲超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二 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定位和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文化重建工作是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重要任务之一,即通过新文化建设在“新”“旧”中国之间划出明晰界线,从而使人民结束“过去”,认同“当下”^④。在以“新中国”“人民性”“革命性”为关键词进行划分后,包括博物馆在内,与新文化建设目标不符的原有文化机构或现象的改造成为国家新文化建设的题中之意。

1949年被接管的故宫博物院,是合并了民国时期北平古物陈列所的新故宫博物院。而北平古物陈列所藏品多是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等清室古物。新故宫博物院,是收藏清室古物最多的博物馆,囊括了数十万件古物、数十万册皇家典籍、数百万件明清档案,以及下辖除北平历史博物馆使用的午门城楼、端门及其两侧房舍外的紫禁城、景山、太庙、大高殿、皇史宬、皇堂子等皇室建筑,这些无不是承载着浓厚皇权和帝制信息的特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人民的政权,为了彰显“人民性”,故宫博物院及其收藏、建筑等性质的改造成为必然。

故宫博物院收藏性质争议由来已久。即使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成开放后,围绕其收藏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是“封建腐朽势力的象征”的争执仍未停止。1928年,经亨颐就以封建遗留之物不宜以博物馆形式继续存在为由提出废除故宫提案。经马衡、张继等大力驳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案》^⑤,从法律层面重申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国有文化遗产属性。此后顾颉刚又从学术研究材料角度提出,“这些荒谬和残忍的遗迹却是研究的最好的材料,因为它们能够清楚地表出历史的情状”^⑥。这就进一步淡化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封建王权性。

1948年底将负责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郑振铎致信夏鼐称,“故宫所藏,因为流传有自‘国宝’”^⑦,坚持了国有文化遗产观念。1949年1月16日,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称,“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它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⑧,从文化价值上强调故宫保护的重要性。但是,随着人民共和国意识的逐渐强化,皇权文化在新政治语境

① 沈雁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指示——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2期,第1页。

②③ 《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1949年3月16日,1951年5月10日,第50、193页。

④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第12辑,2002年,第130~157页。

⑤ 吴瀛:《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编印,第31~32页。

⑥ 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始刊词》第2卷第13期,1926年,第1页。

⑦ 郑尔康编:《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63页。

⑧ 《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问题的指示电》,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中成为阶级压迫的符号。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在人们意识中直接与“恶”“压迫”划上了等号,甚至“有的干脆把文物当作封建遗毒,错误地认为是应该加以破坏的”^①。

此时针对故宫博物院皇室建筑的空间属性之争同样复杂。尽管著名学者梁思成在1950年已从“人民的博物院”角度肯定了故宫建筑的文化价值,“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用,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②。但是,当时社会上对故宫博物院作为博物馆的功能缺乏认识,更多关注的是故宫建筑的封建皇权性,“曾经是封建统治者发号施令地方,也是满足了各朝帝后无耻地享乐和私欲的场所”^③。于是,大量针对故宫建筑的批评和改造诉求出现。并随着新城市建设,逐渐集中到了故宫博物院建筑的拆除改建上来。对此,梁思成多次强调故宫等古建筑在人民政权时代,已不再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而是“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美好的生活而服务了”^④。“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的观点受到公开批评。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⑤随后,北京市规划局拆除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的举动,引发各界对古建筑保存问题的大讨论^⑥。1957年张伯驹向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提出:“确定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对不得拆建或开修马路。”^⑦但是,很快北京市文化局在《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批评故宫博物院的清规戒律多,“不准动原状,不准用灯光,各次陈列迁就主要宫殿”等,导致博物馆“分散零乱,多而不精,参观极不便利。而且对封建落后的陈迹不能大力铲除,保留得过多”,主张对之进行革命性改造,以便“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面貌”^⑧。

针对故宫博物院的整体改造规划,文化部重新定位其为艺术类为主的博物馆,藏品以中国美术品和工艺美术品为中心,计划“把故宫博物院改造成一所大的分类的博物院,以美术品及工艺美术品为主”^⑨。具体计划把故宫建成包括各种类型小规模博物馆组成的博物馆区^⑩。规划筹建的小规模博物馆,既包括在故宫建筑空间内筹建独立的新型博物馆,也有在故宫博物院下建立专题馆(室)等。这样,不仅打破原有故宫博物院单一博物馆的空间布局,同时也带动了陈列模式的变化。

郑欣淼认为当时国家对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定位应是另有政治文化深意,“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⑪。故宫博物院改造定位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历史与传统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无生命的建筑和物件在各时期都被重新审视,无不在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象征性上。紫禁城作为皇权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并未随皇权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以故宫的形式,连带其承载的文化记忆一并留存下来。1949年后国家对故宫博物院“旧物新用”的改造目标十分明确。郑振铎评价当时故宫博物院留下的“好东西实在寥寥无几”,是一堆“乱糟糟的旧家当”,必须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发挥新的作用”^⑫。即滤除故宫博物院收藏、建筑的封建性,替换成革命性,使其能够为新的国家文化建设所用。1954年苏秉琦参观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后,指出“这个展览能够让众多的珍宝和谐地服务于现实需要”^⑬。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此时期国家博物馆改造的目标。

① 彭卿云主编:《谢辰生文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② 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新建设》第2卷第6期,1950年,第17~22页。

③ 杨伯达:《伟大祖国的艺术花朵——记故宫博物院的陈列》,《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第77~80页。

④ 梁思成讲、林徽因整理:《古建序论——在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演记录》,《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3期,第9~30页。

⑤ 何祚庥:《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学习》1955年第10期,第17页。

⑥ 陈生:《关于“保存甚么,如何保存”的争论》,《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第59~61页。

⑦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编:《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意见及本会处理答复》,1957年,第15页。

⑧ 谢荫明、瞿宛林:《谁保护了故宫》,《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68~73页。

⑨⑩ 郑振铎:《一年来的文物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0期,第10~17页。

⑪ 郑振铎:《故宫博物院改进计划的专题报告》,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第207页。

⑫ 郑欣淼:《回眸·检视·展望——故宫博物院80周年》,李文儒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⑬ 苏秉琦:《我从这个展览看到些什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第70~72页。

三 故宫博物院空间、陈列模式和收藏体系的调整

戴维·哈维曾提出：“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物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①作为能够体现社会语境和制度语境的规定性文化机构，博物馆具有通过特定空间、陈列和收藏等具象化传达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独特功用。基于此，故宫博物院在新的改造定位下，从空间、陈列模式到收藏体系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造。

空间上，围绕博物馆区的建设规划，在原有皇室建筑空间内放进符合社会主义文化需求的新型独立博物馆，以淡化故宫博物院封建色彩和民国政府博物馆的意识形态。1949年8月，中央军委即有借太和殿筹设军事博物馆之议。王冶秋建议马衡“将景山全部借予暂用”^②。1950年国庆节，中央军委借故宫午门、太和殿、景山大高殿等举办了“战绩展览会”。有观众认为在“巨大宫廷建筑里的成万件陈列品”，使人感受到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③。1950年8月，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迁入武英殿、宝蕴楼内办公，并于次年在武英殿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④。当时参与办展者称“在清王朝的宏伟的宫殿建筑空间，展出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⑤。1951年初，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借文华殿、传心殿和清史馆办公^⑥。该筹备处1954年与地质部地质矿产陈列馆联合在文华殿举办了“祖国的自然环境和矿产资源展览”^⑦。另外，在故宫内筹建中央民族博物馆的动议也较早。1950年8月，文物局召开筹备民族博物馆座谈会，称建馆目的是“加强兄弟民族的团结”，馆址暂设故宫博物院^⑧。国内各兄弟民族文物展览筹备委员会在保和殿、中和殿筹办“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⑨。次年10月，中央民委“以民族展览会名义”向马衡商借故宫房屋为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马衡“拟以故宫城隍庙借给”^⑩。中央民委遂派人“来商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及陈列室地点问题”，马衡答应筹备处可设在城隍庙，陈列在英华殿举行^⑪。但不知何故，未见民族博物馆实际筹备消息。

1950年后几个中央性的新型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在故宫博物院内设立，并举办新型展览；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和中央军事博物馆筹备处尽管未能正式在内建立，但是也举办了相应展览。这某种程度上落实了使故宫成为博物馆区的改造定位。在空间上，新型独立博物馆的入驻，尤其是举办的展览，将社会主义革命、民族团结以及爱国主义等时代话语带入故宫，并赋予其革命性内涵^⑫。

故宫博物院的专题馆(室)建设同样是空间改造的重要举措。1949年拟定的故宫博物院专题馆(室)调整计划是：“外东路拟改为‘帝、农对比’。南路文化的仍旧，而将帝后生活略为撤除，移至外东路，后殿则设‘帝国主义侵略史料’陈列室。武英殿改为陶瓷馆。内西路大部分恢复原状，而将怡情书史布置农民生活，内东路除钟表、书画、铜器外，余皆为手工艺馆。计划于是确定。”^⑬此处陶瓷、建筑、钟表、书画、铜器等专题馆建设，目标自然是回应艺术类博物馆的定性。专题陈列室中的“清代革命史料陈列室”“帝农生活比较陈列室”及“帝国主义侵略史料”陈列则明显为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而建。

此时期专题馆建设方面，影响较大的有陶瓷馆、绘画馆、国际友谊馆、雕塑馆、织绣馆等。1950年

①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著，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9页。

②⑨⑩⑪⑬ 《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后的故宫》，1949年8月17日，1950年9月11日，1951年10月10日，10月16日，1949年12月22日，第78~79、151、217、218、104页。

③ 华山：《记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0期，第21~29页。

④ 罗歌：《王冶秋与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⑤ 谢炳志：《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筹建与王冶秋》，《新文化史料》1996年第2期，第56~59页。

⑥ 《本局记事·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进行筹备》，《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第92页。

⑦ 《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主办“祖国的自然环境和矿产资源展览”开幕》，《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第37页。

⑧ 《本局简讯·我局为了开展业务，派员前往各地考察，并在京召开有关博物馆、古代建筑问题等座谈会》，《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8期，第178~179页。

⑫ 1958年国家将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新馆建设列入1959年“国庆十大工程”。新馆建成后，先后搬离故宫博物院。1959年中央自然博物馆也搬离故宫博物院。

开始筹划陶瓷馆,文化部首先从全国调拨代表性陶瓷文物进入故宫博物院,如1950年8月,“派佟柱臣去沈阳辽阳一代调查古迹,并运沈阳博物院所藏一部分辽金瓷器来京,以充实故宫陶瓷馆的陈列”^①。1953年陶瓷馆开放,成为全国最大的陶瓷器及陶瓷工艺参观学习中心。同年建成开放的绘画馆,作为国家规划的“中国古典美术的宝库”,建馆目的是希望“我国艺术的伟大传统,在瑰丽的古建筑中发出灿烂的光辉”^②。1949年文化部调集全国珍贵艺术类文物,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伟大的祖国古代艺术展览”。展览后多数书画文物留在故宫博物院,成为绘画馆的藏品基础。此后,持续在全国收集珍贵书画文物补充绘画馆,“四年来辛勤蒐集我国历代古典名画,精选了从隋唐到明清的杰作五百多件”^③。亲历其事的谢辰生回忆文物局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书画这部分都是经张珩和徐邦达过目”,征购来的书画全部送给了绘画馆^④。建绘画馆的目标是改变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性质,“公开展览,使人人可以接近辉煌的艺术遗产”^⑤。1954年建成的国际友谊馆,以展示国际友谊为主题,陈列苏联以及其他民主主义国家送给中国的礼品,包括“绘画、雕塑、陶瓷器、织绣、毛毯、金银器、漆器、玻璃器、玩具等美术工艺品与珍贵的纪念物等”^⑥,一批国际文化交流物件进入故宫博物院。1958年建成的雕塑馆,在郑振铎个人收藏陶俑捐赠的基础上成立,陈列目标是“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传统,用以发展当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雕塑艺术”^⑦。1959年10月1日,位于钟粹宫和景阳宫的织绣馆建成开放,以中国织绣工艺发展史为陈列主题,自商代直至1959年。展品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1949年后的新织绣工艺品,如源自古老织绣技术新应用而制造的古香缎、丛美娟等,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织绣工艺品等,还有农村的挑花绣品等^⑧。将民间文化元素带进了故宫博物院,充分显示了艺术创造的“人民性”,赋予故宫博物院收藏大众的、民族的文化内涵。

专题陈列室建设方面,至1954年故宫博物院完成专题陈列室9个,包括“战国综合馆”“清末综合陈列”“坤宁宫清帝大婚图陈列”“隋、唐、宋、元综合陈列”“长春宫嘉庆时代原状陈列”“重华宫、浴德殿、葆华殿、嘉庆道光时代原状陈列”“崇敬殿原状陈列”“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综合陈列”“储秀宫清末原状陈列”等。与专题馆打破原古物随意散乱放置的宫廷原状陈列相比,专题陈列室在按照社会发展史布置陈列的同时,保留了部分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如长春宫、重华宫、浴德殿、葆华殿、崇敬殿及此后的延晖阁原状陈列等。20世纪20年代,故宫博物院已设书画、瓷器等专门陈列室,“钟粹宫书画专门陈列室及景阳宫宋元明瓷专门陈列室同时布置就绪,对外开放。不久,御书房亦改设为宋元明瓷之扩充陈列室。11月,承乾宫清代瓷器专门陈列室布置完竣”^⑨。与民国时期多依据宫室而设置相应的陈列室不同的是,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则用专题馆形式来集中陈列各种器物,而在专题陈列室设置上更多关照到故宫博物院的宫廷原状陈列。

此时期故宫博物院的调整是全面的,空间布局变动的同时,陈列模式和藏品体系随之发生变化。无论是新建的独立博物馆,还是专题馆(室),基本都采用了新的陈列理念,即以教育广大人民为宗旨。尤其是专题馆(室)的建设,全面贯彻了国家的改造规划,突出了爱国主义等人民教育的使命,如“清代革命史料陈列室”“清代帝后生活史料陈列室”及“纺织品陈列室”等的陈列都是“增加了带有思想教育内容的”^⑩。《人民日报》评价故宫博物院新筹办的专题陈列展览,“此次展览中所陈列满清帝后生活史料及享用服饰是与农民生活用品对比陈设起来的,把统治阶级的生活与被统治阶级的生活作了尖锐的对比,使得观众可以得到更深刻的印象”^⑪。与民国时期陈列意在凸显从专制到共和的对比思路

① 《本局简讯·我局为了开展业务,派员前往各地考察,并在京召开有关博物馆、古代建筑问题等座谈会》,《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8期,第178~179页。

②③⑤ 《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正式开放》,《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1期,第135~137页。

④ 谢辰生:《念往事,忆故友》,《中国艺术报》,2012年2月29日,第5版。

⑥ 李鸿庆:《故宫博物院国际友谊馆开放》,《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第112页。

⑦ 饶惠元:《参观雕塑馆印象》,《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第60~61页。

⑧ 陈娟娟:《故宫博物院织绣馆》,《文物》1960年第1期,第38~40页。

⑨ 徐婉玲:《清末民初中国博物馆规划及其实践——以紫禁城为视域的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2期,第126~138页。

⑩ 李秀芝:《文物事业的开拓者》,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第121~122页。

⑪ 《故宫新辟陈列室尖锐对比帝王农民生活》,《人民日报》,1949年9月6日,第4版。

相比,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的陈列更加突出阶级压迫和物质生活上的对比。郑振铎总结故宫博物院陈列模式的变化,“我们的博物院并不是炫耀陈列品平等丰富与精美的所在”,“乃是宣扬祖国光辉的文化,传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的地方。不是为某一特定阶级而设立的,而是供给广大的人民们以知识与求智的需要而设立的”^①。

从收藏体系上看,在中央性艺术类博物馆的定位下,一方面全国各地代表性的艺术品进入故宫博物院,至1959年故宫博物院新增艺术类文物近14万件。大量的传世文物、考古文物和近现代文物作为艺术品进入故宫博物院并出现在展览中,如敦煌、麦积山及炳灵寺等的精美壁画和雕塑作品^②。另一方面,故宫博物院大量不符合艺术类博物馆性质的收藏则移交给其他文博单位,又大力支持了其他文化机构的建设,“原来博物院内有一个有着的50万册图书的图书馆与有580余万件明清档案的档案馆。为了事业发展的需要,在1955年后分别拨与北京图书馆、国家档案局接管,图书中只留下了博物院需要的部分”^③。1959年接收故宫博物院拨交文物的文博、科研单位及高校就有16家之多,包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自然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中央性大馆以及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地方博物馆等,拨交出文物达数万件^④。内外流动打破了故宫博物院以皇室旧藏——古物、典籍和档案及建筑为主的收藏格局。

四 结 语

毛泽东在1940年描绘的新中国建设蓝图,“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⑤。1949年后对故宫博物院的革命性改造,是新文化建设在博物馆领域的重要实践。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建构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心理基础。作为保存、展示历史记忆的机构,博物馆的作用并不仅限于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将博物馆定位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收藏机构,希望通过物质层面的改造,以达革除不适应新文化建设需要的文化因素。因此,故宫博物院的改造无疑是对皇权文化的再次清算。实践中,用“人民性”置换了故宫博物院建筑、陈列和藏品中隐含的封建皇权元素,在1961年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形式正式纳入国家新的文化建设体系中,获得了新的文化身份。

此时期将故宫博物院定位为艺术类博物馆,虽然窄化了故宫的文化意义,但是,从全国各地调入的代表性艺术品,使故宫博物院突破了原藏品性质的“宫廷”性,成为全国最大的艺术品宝库^⑥。而中央性博物馆的定位,也使故宫博物院在此时期享受到了更多的国家政策关照,成为全国最大的博物馆,奠定了其后故宫博物院的地位。

收稿日期 2019-10-25

作者徐玲,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南,郑州,450000。

(下转第91页)

① 郑振铎:《新中国的文物工作》,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第176页。

② 纪中锐:《工作动态·历代艺术馆的建立》,《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2期,第188~191页。

③ 吴仲超:《故宫博物院十年》,《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2期,第5~9页。

④ 《工作动态·兄弟博物馆及有关文教单位的文物交流》,《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2期,第188~191页。

⑤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⑥ 任昉:《故宫学理论研究述评》,《故宫学刊》2015年第2期,第364~378页。

角度看,尼古拉一世时期压缩小领地贵族数量的政策,也有限制农奴制、改善农民生活的意涵。

收稿日期 2021-12-15

作者李振文,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上海,200433。

The Poverty Problem of Nobility in Modern Russia

Li Zhenwen

Abstract: Nobility was a privileged class of Russia, but poverty was its long-term characteristic. The large number of small estate nobility and their constant bankruptcy were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his problem. The policies of Peter I hit the big nobles and promoted the rise of some small nobles. After Russia's territorial expans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partition of Poland, the local feudal lords entered the ranks of Russian nobles, largel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mpoverished nobles in Russia.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the Russian nobility faced a severe economic crisis. The fall in grain price,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the serfdom economy, the reduction of nobility estate in the core area, the increase in nobility debt, and the sharp decrease of small estate nobles and their serfs, indicated that the nobility poverty problem had become a significant socio-political stubborn diseas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nobility poverty problem showed that the tsarist policy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nobility estate. The long-term poverty of the Russian nobility was not a reflection of its decline, but the result of the openness of the nobility hierarchy,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serfdom economy, and the lack of primogeniture.

Keywords: Russian Nobility; Estate Nobility; Poverty; Serfdom Economy; Tsar

【责任编辑 周祥森】

(上接第 81 页)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Reform of the Palace Museum, 1949—1961

Xu Ling

Abstract: From 1949 to 1961, the dual identity of the Palace Museum as the traditional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e its reform extremely complex. The complexity was not only embodied in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how to deal with the traditional imperial architecture, collection and other materials, but also in the reality aspect of how to adjust the exhibition mode of the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 as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In practice,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d not only expressed distinct political attitude toward the spac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but also given new connotations of socialist culture to the exhibition mode and collection system of the Museum. It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kingship" with "affinity to the people", and completed the revolutionary reform of the Palace Museum.

Keywords: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lace Museum; Revolutionary Reform; Museum History

【责任编辑 翁有为】